

全球化與新都心的發展 曼哈頓意象下的信義計畫區

Globalization and Downtown Development Hsinyi-Planning District in the Image of “Manhattan of Taipei”

周素卿*

Sue-Ching Jou

Abstract

During the 1990s a new downtown emerg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aipei City. Known as the Hsinyi-Planning District, it has been dubbed “Taipei’s Manhattan” and promoted as the most prestigious and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area in Taipei.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this new downtown with reference to literatures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cities and downtown (re)developmen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s on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development and places Taipei in these two analytical contexts. It follows by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planning history of the Hsinyi-Planning District and its policy context. The final part focuses on how the centrality of this new downtown has been constructed in the past decade and how an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downtown for a third-tier global city has been built and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as part of a broader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aipei into a global city, the visions of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aipei’s new downtown should go beyond local city perspectives,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th a view of making it a new urban center with global downt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global city, downtown development, Hsinyi-Planning District, Manhattan of Taipei.

摘 要

本文的目的在檢視臺北市信義計畫區在全球化趨勢下的發展特性，這個副都心其實在 1970 年代即已開始規劃，1980 年代完成都市計畫的擬定作業，不過卻到 1990 年代下半期才快速發展成為新都市中心。文章的第一及第二部分首先探討當今全球化與全球城市的主要論述與相關研究，進而連結至全球化與都心發展的研究文獻，目的在凸顯探討信義計畫區的發展，不應侷限在都市計畫的發展脈絡，而應該放在全球城市的發展脈絡下來思考，也應進而以全球城市的市中心之發展與再發展做為參考架構來討論。第三部份簡單介紹信義計畫的始末及信義計畫區發展的近期政策脈絡，第四部分從信義計畫區的全球城市機能及其中心性的具體形塑，來討論臺北城這個最具全球城市表徵的都市中心之塑造與開發過程，以說明臺北城在回應全球化過程中，資本與國家對都心空間具體的打造經驗。

關鍵字：全球城市，都心發展，信義計畫區，臺北曼哈頓

前 言

信義計畫區是目前臺北城、乃至全臺灣最具有全球城市表徵的新興都市中心，從其規劃的定調到目前的開發，充分地顯示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臺灣從全球製造基地發展成為資本輸出國的一種歷程，也見證了臺灣在民主化過程中不同層級國家之間關係的轉變，更也突顯出土地資本對於都市空間發展的高度影響力。從信義計畫區的地景、都市的機能與活動等層面，可以清楚地區辨出這個都市中心作為市政中心、會議展覽中心、企業總部、國際金融中心、消費休閒娛樂中心、乃至高所得住宅區等的空間特性。在都市政策與都市行銷上，信義計畫區也都是以「臺北曼哈頓」作為發展意象，然其雖和「紐約曼哈頓」具有某種程度的擬似性，但其發展的真實，卻未必具有如 John Friedmann (1986; 1995) 及 Saskia Sassen (1991) 所言，讓特定的都市空間發揮了全球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網絡節點的控管特徵，而成為全球資本積累的關鍵性空間。消費與娛樂性地景、誇耀式的豪宅地景與土地使用方式等是活絡與加速信義計畫區發展關鍵，這種以地區性的消費市場為主導的開發及都心發展型態，雖然解除了信義計畫區遲緩發展的問題，但也顯示了臺北城、乃至臺灣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的競爭危機。

本文的目的在檢視臺北市信義計畫區在全球化趨勢下的發展特性，這個副都心其實在 1970 年代即已開始規劃，1980 年代完成都市計畫的擬定作業，不過卻到 1990 年代下半期才快速發展成為新都市中心。不過，為了避免滑落為一種經驗論的研究取向及論述，本文首先回顧當今全球

化與全球城市研究文獻的主要論述與研究觀點，進而連結至全球化與都市發展的相關文獻，來瞭解當今在全球化趨勢下，大多數城市都市中心（再）發展的經驗。採取此方式，目的是要凸顯探討信義計畫區的發展，不應只侷限在都市計畫的發展脈絡，而是應該放在全球城市的發展脈絡下來思考，也應進而以全球城市市中心之發展與再發展做為參考架構來討論。在此前提下，本文的第三部份將簡單地介紹信義計畫的發展始末及信義計畫區發展的近期政策脈絡，第四部份企圖從信義計畫區的全球城市機能及其中心性的具體形塑，來討論臺北城這個最具全球城市表徵的都市中心之塑造與開發過程，目的在說明臺北城在回應全球化的過程中，資本與國家對都市空間的具體打造經驗，以彰顯這個經驗是如何具體地架構在地方尺度的政治與經濟發展脈絡之下。

全球化與全球化城市

（一）全球化與全球城市的研究

自從 John Friedmann 和 Wolff Goetz 在 1982 年為全球化與世界／全球城市的研究議題拉開了序幕¹，世界／全球城市的研究（包括理論與經驗性的研究）在 1980 年代並未有快速的成長，不過，到了 1990 年代中期，相關研究的數量確有急遽增加的現象，其中經驗研究，以及非世界城市體系頂端的城市之研究，在數量以及能見度的增加現象更是明顯。這個研究趨勢一方面顯示著世界／全球城市的重要性與日遽增，因為這些城市在當今世界人口、商品、資訊、資金等的流動（flows）、連結（linkages）、網絡（connections）、或關係（relations）上，具有顯著的功能性（節點）角色（Beaverstock, *et al.*, 2000a）²。另一方面，則顯示全球化與都市發展之間有著相當複雜的關係形式（Shacker, 1999），因此世界／全球城市的異質性與差異性需要更深廣的比較研究作為基礎，與並需要有更細緻化的理論與概念發展（Taylor, 1999; Beaverstock, *et al.*, 1999）。

過去二十多年來有關世界／全球城市研究概念的進展，主要集中在 John Friedmann 和 Saskia Sassen 所建構的核心假說與概念上（Beaverstock *et al.*, 2000a；2000b）。首先，1980 年代的研究，當然是以 John Friedmann (1986) 為代表，主要在進一步概念化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先進工業國家一些重要城市所經歷的再結構經驗，如何和全球經濟的變遷趨勢息息相關，如何成為全球資本積累的特定或具體化空間。John Friedmann 主要沿用 Fröbel 等人有關「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的概念，來進一步說明世界城市如何成就了先進工業國的跨國資本，得以成功地將工業生產疏散到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的新經濟趨勢？世界城市是這些跨國企業的控管中心（control and commanding centers），也是這些全球資本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的基地（basing points）（Friedmann, 1995; Smith and Timberlake, 1995; Beaverstock, *et al.*, 2000a），因此，全球的經濟網絡相當部分是由世界城市階層在掌控，換言之，世界城市是全球經濟網絡的神經中樞，而企業總部（HQ）的聚集是世界城市重要的城市機能。

到了 1991 年 Saskia Sassen 出版了《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雖然一方面呼應 Friedmann 所示的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是世界城市發展的基礎，但卻嘗試更明確的指出此全球經濟趨勢顯示出雙重的地理性質（Sassen, 1996），一為空間的分散化³，另一為具全球整合性組織的

經濟活動⁴，後者正是成就前者的重要關鍵，也是全球城市新經濟秩序的發展關鍵⁵。更具體來說，全球經濟的空間分散化現象，一面是由跨國企業在執行與掌控商品的生產、流通、交易與消費，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金融產業的國際化與擴張才得以成就，因此，世界／全球城市在經濟的全球化的過程中，不僅扮演經濟活動協調統合的節點性角色，其本身也成為一些新經濟活動，也就是生產者服務業 (PS) 的主要生產與創新中心。

Sassen 更嘗試進一步強調，雖然全球城市是在施行「全球控制 (global control)」的能力，但是她的分析並不在此種「控制能力 (control capacity)」的「權力」分析，而是要聚焦在「控制能力 (control capacity)」的「生產 (production)」之解析，因此，在城市發展議題上，Sassen (1991; 1994) 認為應更具體地探討全球城市作為新經濟的市場與生產地點的議題，這個觀點對日後全球城市特性及階層性的經驗研究之所以集中在生產者服務業的分析上有頗多的影響，當然，成就全球經濟活動得以整合的生產者服務業及金融中心何以有聚集的特性，Sassen 到了 2001 年再版《*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一書時，才增添不少篇幅來討論⁶。

在前述的研究假說與概念所引領的全球／世界城市的研究，有幾點概念上的共識 (Friedmann, 1995)：

1. 世界城市是全球經濟體系的組織性節點，將區域、國家、和國際經濟連結至全球經濟。
2. 全球的資本積累是存在於特定的空間，其面積遠小於世界的總和，世界上大部分的區域與人口到目前為止仍被排除在這些空間之外。
3. 世界城市是經濟與社會互動相當密集的超大都市空間。
4. 世界城市根據其得以指揮的經濟權力差異，而有階層性的安排。城市吸收全球資本的能力決定其在世界城市中的位階，此位階仍可能隨著城市技術創新與政治變遷對於上述能力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5. 對世界城市階層的掌控衍生了一個跨國的資產階級，其階級利益乃植基在全球性的積累，其乃秉持著一種所謂的世界主義的文化與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社會階級和仰賴地方和地域利益為基礎的次一社會階層，通常存在著嚴重的社會衝突。

但是植基在這些概念共識上的相關經驗研究，也被明顯地批評為多以靜態的城市特徵 (attributes) 作為分析基礎，缺乏進一步探討全球城市間的關係／網絡特性 (Taylor, 1999; Beaverstock *et al.*, 2000b)。

上述的這些研究，不論是理論性的或經驗性的，基本上都是以全球城市作為客體／對象 (objects) 來討論全球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或都市體系中既成的特性，此既成特性基本上是以服膺經濟全球化的價值觀與論述來探討全球城市的特性，也是以世界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現實性角色為探討的基礎。這樣的一種討論，缺乏一種城市如何回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主體性思考，極容易讓世界／全球城市的概念落入一種單一化與全稱化的概念模式，也無法協助吾人深刻地瞭解與認識世界城市的異質與差異化特性，更讓都市本身落入一種全球城市與非全球城市的對立與發展焦慮 (Oncu and Weyland, 1997; Smith, 1998; Taylor, 1999; Yeoh, 1999; Marcuse and Kempen, 2000)。因此，Oncu 及 Weyland (1997) 提議以「全球化城市 (globalizing cities)」取代全球／世界城市的思維，以含納那些不在全球城市論述中的城市與地方，來凸顯全球化的發展僵局與矛盾 (Yeoh,

1999)。

簡言之，「全球化城市」的概念對全球／世界城市的主流研究提出了一種反動性的思考，一方面除了挑戰主流研究以特定的世界城市為標的之外，也是要提示「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全球化的複雜與多元化過程 (Marcuse and Kempen, 2000)，此多元複雜的作用過程對都市的影響與衝擊，端非只從廣於都市的空間作用尺度——「全球化」來探討即可，當然，此也絕非以另一個模糊化的作用概念「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來打發，而是要指出全球與地方的具體連結才是重要的分析與理論化關鍵，特別是何以哪些城市可以被成功地整合與連結進入全球經濟網絡與世界城市體系？哪些卻有明顯的失位 (dislocation) 危機？其作用過程與情境的具體經驗分析，乃至比較研究也是不容忽視的研究議題。

最近，Hill 及 Kim (2000) 提出雙元的架構 (binary framework) 來說明全球城市之間其實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異，直接挑戰 John Friedmann 和 Saskia Sassen 等人的全球城市理論，帶出了全球城市理論的全球主義論者 (globalist) 與國家主義論者 (statist) 之間的論辯。Hill 及 Kim 認為：植基在 Friedmann 和 Sassen 的全球城市理論，其實是一種市場中心的 (market-centered)、以中產階級利益為核心的全球城市，紐約為其典型之代表，這一脈在全球城市研究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範型，其實過度地強調全球城市在經濟基礎、空間組織、與社會結構上的同質化發展趨勢。但是，同樣位居全球城市頂端的東京，乃至階層再低一級的漢城，其全球城市特性的發展應是國家中心的 (state-centered)、以及技術官僚主導的發展模式，是發展導向的國家及其政策，特別是國家的工業政策與國家掌控的金融體系，在引領該類全球城市的發展，因此，這類全球城市的經濟基礎、空間組織、與社會結構皆有其異質化之處。

不過，Neil Brenner (1999) 則嘗試指出上述兩種對立的觀點在理論及方法論上皆有其盲思，認為全球化是一種持續變動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關係的空間性乃持續地重組與轉化。具體來說，全球化已使得國家尺度的社會關係失卻其核心性，強化了次國家及超國家地域組織的作用，但國家的領域性仍明顯地和那些新浮現的空間型態⁷交相疊置與組合。雖然該文的重點在理論化全球化過程的空間生產，不是直接回應本段所關注的「全球化城市」之概念，但 Brenner 認為全球化實則是一種多尺度的空間 (之去領域與再領域化) 過程，也強調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挑戰單一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與同質化的全球城市之主流論述。

(二) 城市對全球化的回應

事實上，全球化的趨勢絕非是一種瞬時的巨變過程，經濟全球化所肇致的對於城市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衝擊，在西方先進國家的城市在 1970 年代已經明顯可見⁸，然中心都市之都市問題的肇始，主要源自郊區化問題，爾後才更為經濟的全球化所強化。以美國的城市體系為例，在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期那段時間，幾乎所有的都會區都受到經濟再結構的明顯衝擊與影響，因此，都市政策明顯地從分配面轉向發展面以為因應。到了 1980 年代中，新的經濟情勢——經濟全球化的態勢已相當明顯，除了少數無法從工業城市轉型的都會仍受到發展的侷限外，大多數的都會區，特別是傳統製造業帶的重要城市，也都有所轉型，找到新經濟的利基與都市發展的出路。不過，各個城市對於發展問題的回應，其實是一連串的變遷、回應、調適與發展的探索性歷程。

這樣的一種歷程其實也是可以從新興工業發展國／經濟體的重要城市發展經驗中見證。亞洲的新興工業發展國／經濟體的重要城市自 1970 年代開始成為先進國家的重要製造基地與加工出口的月臺、甚或貿易據點，此種資本的流動，間接地肇致先進工業國去工業化的都市發展問題，以及這些新興工業發展國／經濟體快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但到了 1980 年代中，這些新興工業發展國／經濟體也在世界經濟版圖中，成為資本輸出國，快速地將生產具體移往第二層的新興工業發展國／經濟體（如東南亞和中國）（周素卿、陳東升，2001），在這個發展的時程上「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經濟趨勢及相關的制度條件發展更加迅速，讓這些國家／經濟體及其國境中具連結機能的世界城市，也面臨這巨大的轉型與發展壓力。因此，從各個城市的都市政策、都市計畫、重要的都市開發計畫、與都市地景的變遷上都可見諸端倪。

也就是說，全球化城市⁹也應該進一步具體地從都市的回應與出路來探究，雖然這個部分的文獻，通常不在研究全球／世界城市的主流文獻脈絡中出現，大多是在探討都市發展的相關文獻中比較可見。雖然，相關的研究不勝凡舉，如果放在與都市發展與規劃的政治面向相關文獻脈絡來看，如前所言，自從 1970 年代歐美先進國家的城市開始面臨產業與空間的重構以來，如何診斷與解決都市的財政與經濟危機？如何留住中高所得的納稅人？如何吸引新型態的產業進駐？如何創造都市的榮景意象？已經成為多數城市的共同課題，因而促使都市規劃與都市政治的議題從分配面轉至發展面的討論（Logan and Swanstrom, 1990）。因此，都市發展的文獻已經開始注重都市規劃與都市政治的議題。

但早期的文獻仍多集中在理論層面的探討，多以討論國家的角色與作用為主，但到了 1980 年代末期以後，在全球經濟重構的發展脈絡下，以比較研究的觀點來探討都市規劃與都市政治的運作對都市發展的影響（Savitch, 1988; Fainstein, 1994）。而 1990 年代至今，多數的文獻則集中於討論在城市尺度的都市政治與政策特性對於都市再發展的影響，都市的治理結構與都市政權的討論與比較研究，成為理論與（比較式的）經驗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的核心焦點（Healy *et al.*, 1995; Lauria, 1997），但這卻都是在經濟面的，也就是「全球化」脈絡下的探討。

因此，經濟面的全球化趨勢所啟動與肇致的全球都市化過程，基本上也是一種激烈的城市競爭過程，對個別城市與特定都市空間而言，都市政策與規劃愈來愈趨於顯著與關鍵性的位置，但是個別城市在發展的競爭上又有其特定的政治與市場特性，因此，在探討全球城市的都市化過程（特別是最具全球城市的表徵性空間），個別城市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市場與規劃的時空（歷史地理）動態性，是必須深入考量，也是經驗研究最重要的分析脈絡。此即如 Savitch (1990) 所指出的，個別城市之雖然出現一種「政治的離心化（centrifugal politics）」現象，但是「資本主義的向心化（centripetal capitalism）」趨勢卻是非常明顯。Leo (1997) 也呼應在全球化趨勢下，都市與都市間明顯可見在都市的發展政治與計畫上有著「全球的同質化（global homogenization）」，以及「地方政治的特異化（the politic of particularity）」的並存現象。

全球化與都心的發展

在都市發展的政治與規劃經驗上，以美國經驗來看，多數的城市並不必然是直接在回應經濟全球化下的城市競爭，其實多半是在為如何讓內城復甦、如何讓中心商業區重拾人潮與商機尋找出路 (Frieden and Sagalyn, 1989)，對那些在世界城市階層中有著重要地位的城市來說，情形也是類似。因此，Beauregard and Haila (2000) 嘗試指出城市的發展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其都市發展與空間形式也是在多重作用力的影響下形成的，不是可以單純地歸因於全球化的作用。再者，政府部門、開發商、金融業者、建築與規劃專業者對都市的作為，也不必然直接是在回應全球資本的運作與需求，而是其有各自有的行動邏輯與自主意識。此外，城市的空間發展也不可能一夕驟變，大規模與聚落的轉型並不太容易發生，因為資本常是凍結在具體的構造物中，且人對於地方的政治與社會的投注並不是那麼容易取代的 (Beauregard and Haila, 2000)。

但縱然如此，公私聯手／合營的新治理型態、企業城市或民營化的城市政權已經明顯地成為一種流行的都市政治及其再造城市的新價值觀與意識型態 (Harvey, 1989)，此外，市區的購物中心及相關的標竿計畫 (商業辦公大樓、旅館、會議中心、巨蛋、博物館或劇院……等的開發計畫) 也成為城市間競相效仿的都市發展計畫，當然這其中市中心、乃至「中心商業區 (CBD or downtown)」的開發計畫通常是最為重要的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 1980; Frieden and Sagalyn, 1989; Fainstein, 1994)。當然對先進國家後工業城市的都心的發展來說，其長程的經濟基礎確實還是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植基在如 Friedmann 和 Sassen 所言的企業總部¹⁰和生產性服務業之基礎上，以及這些新的產業基礎所支撐的勞動人口的消費、休閒娛樂與再生產活動，當然，也包括因為城際網絡的活動所帶進的觀光消費人口。因此，中心商業區的再發展與開發計畫，最常被當作城市回應全球化的具體作為，也常被當作全球城市新空間發展趨勢的具體展現。

在此情形下，城市的開發計畫也愈來愈傾向於以誇耀式的大型計畫 (urban mega-projects) 在重塑都市地景¹¹，並以國際化的城市意象與現代化的文化來包裝這些開發計畫 (Ford, 1998; Olds, 2001)。這些誇耀式的大型開發計畫所重新創造的新都市空間通常是都市中心商業區的擴延、或是在其他有待更新轉型地區 (如舊鐵道、舊碼頭、舊工業區、軍事用地、...等) 的大規模用地上，創造出以標榜國際接軌與全球化活動的新都心計畫或大規模的建築構造物開發計畫，也就是說，嘗試建造一具全球城市機能的都市區域。

這個都市發展趨勢，在 1990 年代並快速地延燒至太平洋地區的全球城市，特別是新興工業發展國／經濟體的首要城市 (Olds, 2001)。以臺北城來看，信義計畫區的發展某種程度也是有著相類似的歷程與特性，特別是「臺北金融中心」(現已改名為「臺北 101」) 的開發計畫更凸顯了全球城市都心發展的「全球同質化」現象。再者，這個同質化的發展趨勢通常是以「紐約曼哈頓」作為新都市開發計畫的擬像，以建造「金融中心」為口號，並以「摩天大樓」俱樂部的競逐¹²，來誇耀及促銷城市在全球城市上的競爭與突圍雄心，當然這並不是表示這些空間在全球城市階層中真正具有競爭的實力。

打造臺北「曼哈頓」

臺北市的空間發展，約從 1967 年改制為直轄市後，即有更加快速朝向東軸線發展的趨勢，而「信義計畫」是眾所公認促使臺北市在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快速朝向東軸發展、並導致臺北市發展成雙核心的都市結構¹³ 最具關鍵性的政策與計畫，也是臺北市新都市機能與土地使用型式最具宣示性的規劃實踐場域（曾旭正，1994；周素卿，1997）。但是這個由地方政府主導規劃的都市計畫特定區，從其完成土地重劃（1986）與點交（1987）後十年間，仍屬於低度發展的狀況。截至 1997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區內仍有百分之六十一的未開發土地（清寰管理顧問公司，1997），這樣的一種發展步伐與發展密度相當高的臺北都會區、以及經濟與土地使用機能愈益高級化的臺北市顯得相當地不搭調，對都市規劃在都市發展中的角色扮演相當具有諷刺性。不過在最近五年間，信義計畫區的開發與發展已明顯地加速，且漸次發展成為臺北城重要的地景構成（a constitute of urban landscapes）與市民生活的重心。

由於信義計畫區是臺北市唯一具有超大完整的街廓設計與完善的都市規劃設計的商業發展區，發展潛力本已備受市場肯定，其中已有臺北市政中心和市議會、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國際會議中心等公共機關，凱悅大飯店、亞太商務會館，中國信託、中國石油、國泰、新光、霖園、國巨、群益、震旦行……等的企業總部及辦公大樓，華納影城、新光三越、紐約紐約、新舞臺等的娛樂、休閒購物與展演場所，更有號稱五百公尺世代的摩天大樓—508 公尺高的「臺北 101」之興建，……。此外，信義計畫區內住宅區，不僅地價居於全市之冠，也是臺北市內最高級的住宅區之一，更是臺北市「豪宅」最密集的集結地區。這樣的一種都市機能與地景特性，在臺北市第一任的民選市長—陳水扁所曾宣示的：以「臺北曼哈頓」作信義計畫區的發展目標，最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雖然信義計畫區已具備有成為臺北市中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產業與土地使用機能（金融、商務服務、會議中心與展示、企業總部、大型構物中心、商務住宅、電影娛樂城、高級住宅……等）之區域特徵，但是信義計畫區曼哈頓化的條件與機制，除了植基於臺北市在全球城市產業機能的形成與需求的經濟層面外（蔡建國，1998），其實更是立基於臺北市在都市規劃、都市政治與都市房地產的運作特性上。這個部份已有研究透過信義計畫區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動態性來掌握，具體地分析影響信義計畫區發展的關鍵作用者、這些作用者間的關係形式、及其在不同階段對信義計畫區發展特色的影響（周素卿，1997）。但是信義計畫區在近五年內的發展，卻是伴隨著相當密集的意象形塑與新都市消費活動，也就是在其具體的發展過程中，有著相當明顯的文化資本運作的鑿痕，因此，如果侷限在僅以土地與金融資本的市場運作邏輯和國家的介入來分析信義計畫區的都市機能與土地使用狀況（周素卿，1997；蔡建國，1998），是無法充分掌握信義副都心這個臺北市的新都市中心，在全球化的新都市發展趨勢、及在地化的新都市政權運作特性下的空間發展性質與真實內涵。

事實上，「打造臺北曼哈頓」涉及的不只是臺北城在全球尺度的競爭條件，這不僅是經濟的（生產性服務業相關活動的吸引與衍生，都市與地方的行銷），也是社會與文化美學的（高所得者的居住、消費與休閒活動之形成與品味創造）、更是政治的（政治的動員與政權的取得：民粹主義的創

造或民主選舉的綜藝化，空間不正義的強化)。而後兩者的討論正是探討後工業城市在全球化的支配性作用、與地方特性的回應時所不可忽視的課題。

臺北城新都心的塑造與開發過程

(一) 信義計畫區的全球城市機能

信義計畫區自始議、定案到開發至今，基本上，具國際連結性之信義副都心發展基調，是經濟部在引領與擘化的¹⁴，並且經濟部也是以「國際經貿中心」的定位來開發信義計畫區中的「臺北世界貿易中心」¹⁵，事實上，這種都市及空間機能是植基在臺灣作為全球重要代工基地的經濟基礎之上¹⁶。至於信義計畫區的商業機能，特別是企業總部及國際性商業活動機能，在財團坐擁土地但卻延遲開發的情形下，到 1990 年代中期還是遲遲未能實現 (表 1)。

表 1 信義計畫區土地開發項目

年	方 式	項 目	年代	方 式	項 目
1986	住宅	鴻喜花園廣場	1998	住宅 商業	信義富邦、太平洋凱旋花園 華納威秀 ATT、群益金融大樓、昇陽國際金融中心、亞太商務會館
1989	住宅	亞歷山大			
1990	公共機關 飯店	國際會議中心、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臺北市議會 凱悅飯店			
			1999	公共機關	臺北世貿中心二館
1991	住宅	昇陽國寶	2000	住宅	華納花園、冠德名門、御之苑、信義之星 紐約紐約、新光人壽曼哈頓金融大樓
1992	住宅 商業	臺北高峰會 震旦行大樓		商業	
1993	住宅	國王與我			
1994	住宅 公共機關	凱悅皇家 臺北市政府、信義行政中心	2001	住宅 商業	國家藝術館 中國石油大樓、NEO 19
1995	住宅	維也納藝術廣場	2002	住宅	臺北花園中心 新光三越二館
1996	商業 公共機關	中信大樓、新舞臺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商業	國泰霖園金融大樓 新光三越三館、統一總部 (預定)
1997	住宅 商業	冠德花園、千喜林園 新光三越信義店、華納威秀	2003		
			2004	商業	臺北 101 (預定)

資料來源：林潤華 (2003) 象徵地景商品化過程中地方性之生產——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之豪宅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附註：所列年限，住宅開發項目所指為開工年，其餘開發項所列為啟用年。

臺灣其實在 1990 年代已經明顯地成為資本輸出國，相當多大企業也開始採取跨界生產的分工形式，但是，臺北市對於臺商跨界治理所需要的企業指揮控管與生產者服務等相對應的都市機能與基盤設施，回應得並不積極，從相關活動的都市聚集特性來看¹⁷，臺北市基本上是以分散式商圈的空間架構在因應全球城市競爭下之都市機能及其空間需求（周志龍，2002）。

也就是說信義計畫區規劃藍圖所欲勾畫的一種具全球城市機能的新都市中心特性¹⁸，在地區發展上，雖然是具有經濟上的潛力與需求，但是，在整體政經條件存在著地產資本有機會藉由信義計畫區來操弄壟斷租的情形下¹⁹，信義計畫區商業地產的開發竟然延宕到 1990 年代下半期才比較明顯地啟動起來（表 1），而這個發展時機所顯示的是：在空間上，信義計畫區的「中心性」已經明顯浮現，但在經濟上，卻因為中國經濟區快速的崛起與發展，以及臺灣慢慢失卻對外資的吸引力，使得臺灣區域中心的角色漸顯式微，也慢慢地失卻主導臺資在兩岸跨界分工中的治理性角色，致使臺北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優勢與定位受到嚴苛的挑戰。相對而言，信義計畫區這個新興的市中心能否成為全球經濟網絡與全球城市階層中具競爭力的資本積累空間？也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如若不從城市（經濟）競爭的角度來分析信義計畫區的空間發展過程，純粹就其本身的發展歷程、及參就其他（全球）城市都市中心空間（再）發展的經驗來看，信義計畫區的全球城市意象和中心性的創造，在分析上卻可以從以下的幾個關鍵性的面向來探討。

（二）市中心的位移：中心性的建構

從前面的討論與先前的研究（周素卿，1997）綜觀之，信義計畫區作為一種全球城市的具體化空間，在規劃的層次與政府的施為上，並不是一開始就有非常具像的全球城市功能及都心發展藍圖，但是，就空間的規劃與設計的特色來看，信義計畫區是臺北城在 1980 年代至今，最擬似西方城市中心商業區機能的區域，這個都心的中心性建構，首先是由房地產市場的運作成型，再由行政中心遷入後的活化作用與都市計畫手段的運用，加上國家與企業聯合打造全球超高大樓與亞太金融中心的企圖，以致娛樂與消費地景的開發主導等，漸次引領成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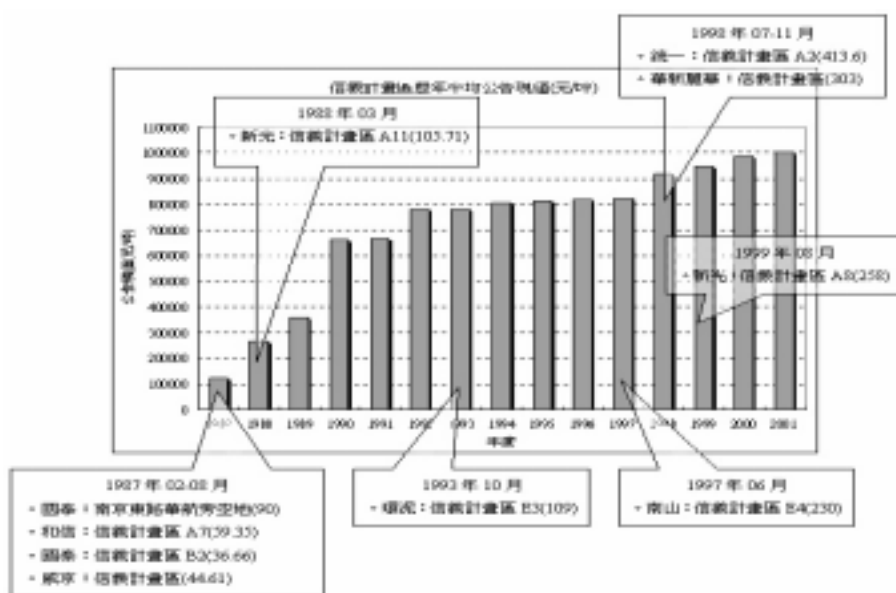
房地產市場的運作與都心的建構

根據許多城市的發展經驗來看，都市中心通常會明顯地反映在都市地價的空間結構之上，信義計畫區成為都市高地價分佈的中心點，正足以反應都市中心性的取得。也就是說，信義計畫區成為臺北市新的都市中心，可以從房地產市場，特別是地價的變動得到明顯的確認。

首先，大型財團競相以高價競標取得信義計畫區內的土地，不僅促成信義計畫區的地價快速成長（圖 1），也全面帶動臺北市土地價格的上揚（圖 2）（周素卿，1997；蔡建國，1998）。大型財團在信義計畫區取得土地，之所以被責為土地炒作，主要在其透過國有地的釋出取得並持有臺北市特定規劃、且絕無僅有大街廓地段的土地，但卻延遲開發，不僅影響了信義計畫區、也影響了臺北市整體的都市發展計畫，明顯地創造與坐收「壟斷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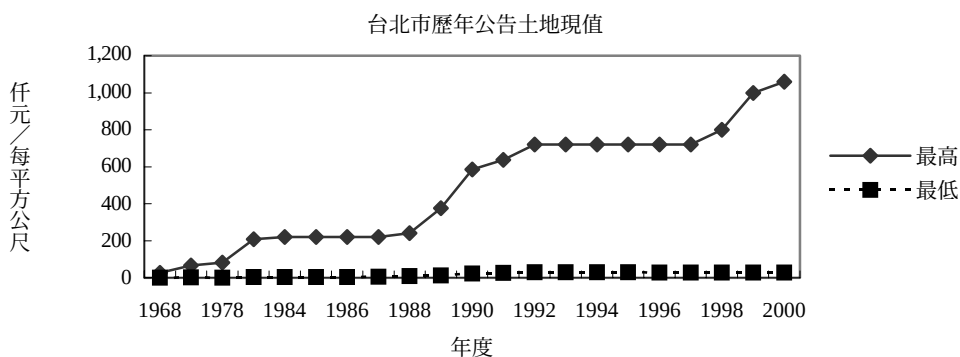
再者，信義計畫區已明顯地發展成為臺北都會區第三代豪宅的聚集地²⁰（臧家宜，2001a；2001b；2002；林潤華，2003）。信義計畫區高級豪宅的開發與建設²¹，除了反應地段（或區位）與土地價格的作用外，其實高級住宅區的開發讓信義計畫區發展成為臺北市的「首富街廓」²²，進而

對信義計畫區作為一個「高級」的都市中心之地位與聲望的打造，也起了相當明顯的作用，並明顯地反映在都市的地價結構上。



資料來源：林潤華 (2003) 象徵地景商品化過程中地方性之生產——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之豪宅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整理自歷年臺北市統計要覽、周素卿 (1997)、臺北市府都市發展局 (1994; 2000))

圖1 臺北市精華地段公有地標售時間點與信義計畫區地價變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北市統計要覽 (歷年)

圖2 1968年後臺北市歷年公告土地現值趨勢圖

政治的動態與中心性的建構

臺北市政府市政中心的移入，是強化了信義計畫區中心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在此想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心性並非是行政機能（市政中心）所成就的，而是藉由政治的運作所增強，因為，市政府對於信義計畫區的低度發展，在市長民選前後有相當大的差別。

臺北市政中心在 1994 年底正式啟用後一年，首都政權即由藍（國民黨）轉綠（民進黨），市政府即積極地藉由市政中心來展現其權力基礎與權力象徵，例如，市府大廳的改造、府前廣場的設計及活動的舉辦，一方面是在展示其民主政治下的合法化來源與政治基礎（為市民頭家服務），再方面節慶與綜藝式選舉動員活動拼場的人氣，間接地也帶動了娛樂及消費性產業在信義計畫區的活絡性。

再者，陳水扁市長為凸顯其民選市長的積極作為，也以「加速信義副都心的開發」與「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來回應信義計畫區低度發展的問題，但卻是架構在臺北城的國際化目標之下，也就是相應於在政治面以城市外交為手段，在經濟面則配合中央政府以亞太金融中心的構築，作為改造臺北城以因應全球城市競爭的積極策略之一（陳水扁，1996；張景森，1997）。

簡言之，在陳水扁市長取得首都政權之後，市政府一方面透過都市計畫的機制與都市行銷的手段嘗試活化與創造土地利益，再方面也與消費與娛樂機能相互強化，而成就地方政府與企業彼此的政治資產與經濟潛力。然而，這兩部分，雖然在第二任民選市長繼任後，並未有所轉變，但卻因為選舉與政治運作策略而為馬英九市長所避談²³。

奇幻城市 (fantasy city)²⁴的興起與都心的強化

信義計畫區經由政治作用所形塑的中心性，在 1998 年後明顯地轉由娛樂與消費性活動的活絡商機所取代，也更明顯地宣示了信義計畫區這個臺北城新都市中心的發展是由美式概念的「娛樂經濟 (entertainment economy)」所刺激與主導的，因為華納威秀的進駐是信義計畫區發展最為明顯的轉折（許雲凱，2002）。

華納威秀是第一個進駐臺灣的美式影城，採取整套移植國外複合式影城的開發與經營模式，進駐信義計畫區後，每年的觀影人次已超過三百萬，間接也刺激了旁邊標榜日系經營的新光三越百貨年營業額快速的成長。因此，也更凸顯此都心發展成為高級購物中心的潛力，包括從日系經營理念漸次轉為本土化經營知能的「新光三越」，以及強調美式百貨公司概念的「紐約紐約」，還有走主題式精緻飲食與個性品牌的 Neo19，當然，未來更要加入強調以全球精品旗艦店為購物中心發展重點的「臺北 101」。

這些高檔次的娛樂與消費文化都明顯地促進了信義計畫區都心的地位²⁵，使其得以在臺北城的空間層級中明顯地提升，而與歷經再發展之西門町有明顯的區隔。這個現象也可以從影音活動在兩個都市中心的發展差異見諸（表 2），例如，華納威秀基本上是以國際性的影音活動為主，西門町相較而言，則是以本土或華人影音活動的促銷佔較大的比例。

然而，信義計畫區消費與娛樂中心的特性並非完全是由大眾消費與流行文化所建構，中信集團所資助成立的「新舞臺」，已經成為臺北城中非國家支持的高品質的展演場地，此外，購物中心中的高級藝廊與展示場²⁶，也凸顯此都市中心所具備的精緻文化基礎設施。

表 2 西門町與華納威秀影音相關活動之比較，1998-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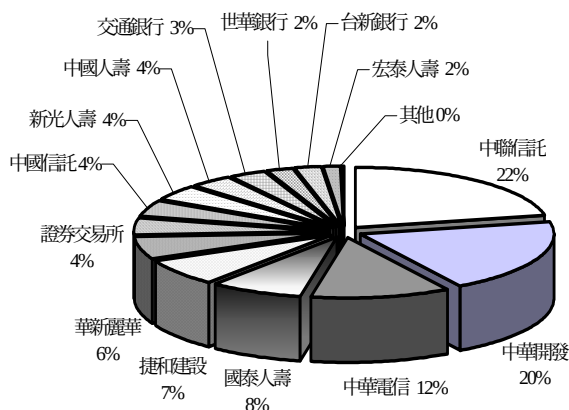
活動性質	華納威秀		西門町		總數
	華人	外國	華人	外國	
電影 (首映與促銷)	14	27	9	17	67
明星與歌手演唱會	25	10	95	17	147
其他	48	42	166	46	302
總數	87	79	270	80	516

附註：華納威秀是在 1998 年 1 月 16 日開幕

以曼哈頓為慾想對象之亞太金融中心

當然，信義計畫區最具象徵性意義的中心性建構，要以「臺北國際金融中心」的開發計畫最具代表性。如眾所周知，「臺北國際金融大樓計畫」是臺北城採取「公私合夥」模式，成就信義計畫區發展成為臺灣國際化櫥窗的具體行動（茂林國際開發顧問公司等，1996；蔡建國，1998；臺北市政府，2000），目前已更名為「臺北 101」。整體的建築物包括裙樓及塔樓兩部分，裙樓總面積約 76,000 平方米，主要以作為購物中心的使用為主，預計 2003 年 11 月 14 日開幕，而塔樓則預計於 2004 年完工，整棟大樓標高 508 公尺，總計有 67 個樓層、樓地板總面積為 218,000 平方米，完工啟用時將是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樓，也將成為全球辦公大樓單一量體最為龐大的招商個案。

而其開發資金雖為本土資本的組合（圖 3），然其建物的開發活動，也就是摩天大樓的建造活動，則如全球的趨勢，是高度仰賴全球性資本與技術的組合（表 3），且在行銷與經營管理上也是



資料來源：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圖 3 臺北國際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結構

表 3 「臺北 101」之建造團隊

工程名稱	臺北國際金融中心新建工程	
工程地點	中華民國臺北市松智路 8 號	
業 主	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顧問	美商端拿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結構設計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設備設計	大陸設備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工 期	裙 樓 部	塔 樓 部
	民國 88 年 6 月 1 日 至 90 年 10 月 2 日	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 至 91 年 8 月 28 日
工程規模	地上部 7 層 地下部 5 層	地上部 101 層 地下部 5 層
用途規劃	出租商場、停車場	辦公大樓
結構形式	地上部—鋼骨造 地下部—RC／SRC 造	
基地面積	30,277 m ²	
建築面積	15,081 m ²	
建築高度	508 m	
總樓地板面積	412,500 m ²	
施 工 單 位		
總 承 包 商	建築工程	株式會社熊谷組
		華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大友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專 業 分 包 商	鋼骨工程	新日本製鐵株式會社
		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電梯、電 扶梯工程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帷幕牆工程	嘉特納 (香港) 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高度地仰賴外資，例如其購物中心的經營管理是由澳商聯德利 (Lend Lease) 國際 (股) 公司臺灣分公司來擔任顧問，而辦公大樓物業管理也是由高緯物業 (Cushman & Wakefield) 顧問公司來擔綱。除了因為臺灣在外人投資房地產的法令限制，致使外資無法擁有此類型房地產所有權這一因素外，臺北城新都心的地標式建築—臺北 101，也和全球城市誇耀式大型計畫 (urban mega-projects) 的建造與經營一樣，是由少數的國際資本在壟斷與主導的。

隨著「臺北 101」之興建與開發腳步，辦公大樓的開發計畫也成為 2000 年代初期信義計畫區地產開發的重心 (表 1)，支撐信義計畫區國際金融中心與業務中心機能的營建環境已漸次形成，信義計畫區的都心機能與地景，也漸漸地發展成為具「美式概念」的金融中心——也就是曼哈頓地景的意象與擬物，成為全球城市發展同質化趨勢之具體明證。其中「臺北 101」，就如同屹立在其他全球城市的超高大樓一般，已經成為全球城市的新紀念性建築 (monumental structures)，不僅僅成為臺北城的新地標及都市再中心化的磁石，更也成為城市對外行銷與對內建立認同的新利器，誇耀著其所佇立的臺北城已經有成就世界級設施與建物的技術能力與資本，也宣示著臺北城競逐亞太金融中心的雄心，雖然，以「臺北 101」為核心的「臺北曼哈頓」區，是必須建立在臺北城在全球市場上的經濟實力²⁸。

結 論

從前述的討論，當然無口否認「全球化」、特別是「經濟的全球化」對城市發展有著結構性的作用，此外，城市的回應與作用，雖因城市的個別差異與全球化的複雜性，而未必相似，但是從城市的發展經驗與地景上，我們猶可見諸過多的全球化的同質性鑿痕，這其中，都心的打造是各個城市在回應全球化歷程最為具體的回應與呈顯，也是本文經由信義計畫區的個案分析所欲呈顯與呼應的。

以臺北城在全球城市階層或網絡中的地位來看，雖然絕對有資格成為世界／全球城市俱樂部的會員²⁹，然其位階及競爭力相對而言並不高³⁰。這一方面反映的是臺北城在「全球化」趨勢下全球城市角色機能的展現，再方面臺北城在政策面當然也亟思積極地透過都市計畫與相關的開發計畫來維持、乃至競取快速經濟變遷下的全球城市地位，當然，以信義計畫區的空間特色來看，是臺北城最具有能回應世界城市新經濟與社會活動機能的空間，然都市中心的打造與全球城市機能競取之間的關係形式究竟為何？過去的相關文獻並無具體的交會性探討。

也就是說，過去的文獻缺乏探討都市空間的生產如何真正支持 (facilitate) 了全球經濟體系中城市的網絡關係？Sassen (1991; 1996) 這個文獻脈絡的討論，基本上是從經濟的需求面來推論新經濟的空間聚集特性，著重於討論經濟的連結及活動型態的需求，以及勞動力再生產及生活方式的需求。Fainstain (1994) 的這個文獻脈絡，則比較是從供給面，亦即房地產資本 (地產邏輯) 及 (都市發展) 政策的創造及導引如何回應全球化趨勢下城市的衰頹與競爭。事實上，如果從空間生產層面，亦即實質環境的供給面來看，全球城市都市中心性是充斥著被神聖化、被特權化 (privileged) 的一種空間的打造，基本上，這類具全球城市機能與表徵的聚集都市空間，是地產資本創造象徵空間與壟斷租的一種地產邏輯，也是都市政府以私有化城市或企業城市回應都市發展問題的一

種策略。

總言之，本文主要從都市計畫、地方政治與都市發展的角度與脈絡出發，具體地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為例，來說明臺北城最具全球城市表徵的新都市中心的發展歷程。這樣的一種討論方式與分析取向，主要是要提出一種和目前較具主導性的「全球城市」研究有所相異的分析觀點，因為目前攸關全球城市的研究，幾乎都是由全球經濟機能形塑的角度來討論，具有某種程度的經濟化約論傾向，也幾乎完全是從全球經濟活動的指揮控管機能與跨界治理的角度來思考全球城市的特性及機能，因而全球城市的地景及其表徵空間的發展，某種程度也被化約為必須建構在城市所具有的全球網絡功能之上。事實上，從信義計畫區中心化歷程的探討與檢視中，我們可以發現以生產及生產性服務業為基礎的全球城市，不必然完全主導著全球城市的中心化發展，消費導向的全球城市，也成為全球城市發展的重要現象與新契機，而此或許也更是非位於全球城市體系頂端的都市，其全球城市機能發展的重要現象與特性，值得進一步地檢視與廣泛地比較研究。

謝 辭

本研究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打造“臺北曼哈頓”：新都市中心發展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計劃編號 NSC91-2415-H-002-022），特此申謝；另要感謝林潤華與王茜穎同學協助繪圖與蒐集資料；最後，要對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周志龍教授和地理學報的審查者所提供的修正意見，表達感謝之意。

註 解

1. 雖然 Patrick Geddes 在 1915 年已使用「世界城市」這個名詞，來指稱世界商務所發生的重要城市與地點 (Short, 1996)。此外，Beaverstock *et al.* (2000a) 則認為 Peter Hall (1966) 是研究當代的世界城市的肇始者。
2. 近年來也有文獻已經開始質疑世界／全球城市的概念及其理論，認為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基礎 (Taylor, 1999)，此外，如 John Friedmann 等人所嘗試建構的世界城市體系及其階層，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公共論述”下的一種“社會建構”(Smith, 1998)，也充斥著馬派的經濟化約論、新古典經濟的市場優先論、現代化理論的歷史單線論、以及美式的族群中心論等的全球城市假說論述 (White, 1998)，此當然，也在質疑在 John Friedmann 和 Saskia Sassen 所影響下的主流世界城市研究文獻所宣式的世界／全球城市角色與功能。
3. 此特別是指製造生產。
4. 此可以指稱生產者服務業。
5. Sassen 的論述基本上是植基在以最頂層的全球城市—紐約、倫敦與東京的角色與經驗為分析基礎，也就是以之作為服務全球資本運作的縮影之分析上來立論。
6. Sassen 對全球城市的另一個重要特色的討論是在其社會的極化發展 (social polarization) 上，因為不是本文後續的討論重點，因此，此部分的討論暫略。
7. 如 EU、NAFATA、ASEAN 等區域性組織，或世界銀行、WTO 等世界性組織所涵蓋的空間領域。

8. 特別是對內城及其中心商業區的衝擊都極大。
9. 即指全球化對城市的作用與衝擊。
10. 雖然，確實有文獻 (Lyons and Salmon, 1995) 在探討與分析，跨國企業的企業總部位於世界城市及中心商業區並不是一個必然的現象，企業總部也有疏散 (或回流至) 區域中心的趨勢。
11. 倫敦船塢區及巴黎 La Défense 即是最有名的例證 (Olds, 2001)。
12. 參考 Smith (1999)、Davey (2002) 和 Olds (1995) 的報導與研究。
13. 臺北城目前已漸次發展成為一種多核心的都市結構。
14. 因為，就臺北市政府來看其原來的都市計畫目標是：建設信義計畫區成為現代化副都市中心及示範性住宅社區，也引導臺北市健全均衡之發展 (臺北市政府公告，2000)。
15. 包括國際會議中心 (1986)、國際貿易大樓、凱悅大飯店、以及展覽大樓 (1990) 等四座功能不同的建築 (參考 <http://www.twtc.org.tw/>)。
16. 針對此論點，金家禾 (2002) 與林德福、劉昭吟 (2002) 兩篇論文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17. 當然在後工業、服務導向的全球城市之經濟發展特性下，新都市活動的聚集特性是植基在產業的區位需求？抑或是一種地產開發的取代與引領？過去的文獻中討論得並不够精確與具說服力。
18. 此乃經由探討信義計畫區從擬議、規劃、實施與開發的具體歷程分析所得 (周素卿，1997)，不是僅從第二次通盤檢討前的都市計畫和建築與與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等判斷之。
19. 詳細的討論請參考周素卿 (1997)。
20. 根據臧家宜 (2001a; 2001b; 2002) 的報導指出，臺北市的豪宅 (也就是高級住宅) 的發展大概可以區分為三個世代，第一代豪宅是指 1986 年以前蓋建的分佈於郊區的別墅型高級住宅，其中陽明山區仰德大道旁的高級別墅最具代表性，擁有者多為政要與 (傳統企業的) 富豪。第二代豪宅則為 1986 至 1998 年間蓋建於市中心的獨棟大廈型豪宅，主要分佈於仁愛路與敦化南路，信義計畫區開始開發後亦成為重要發展區，擁有者則以高官政要與企業富豪為主，也包括新興電子產業的企業主與高階經理人。第三代豪宅則是集中型的大廈型豪宅社區，主要以信義計畫區的新興叢聚型大廈豪宅為代表，擁有者則以社會名流及企業富豪為主。
21. 各開發案的發展請參照表 1，更詳細的經驗研究內容亦請參考林潤華 (2003)。
22. 臺北花園的廣告文案。
23. 或許是因為現任市長馬英九曾以「軸線翻轉」作為選舉的政治訴求，再加上，信義計畫區發展過程所蒙受的財團主導與壟斷之情形，唯恐空間不正義的問題成為政治的負債。
24. 此乃引用 John Hannigan (1998) 在《*Fantasy City: Pleasure and Profit in the Postmodern Metropolis*》一書中所指出的：以娛樂休閒及消費所構築的後現代城市特色之概念。
25. 華納威秀的人氣指數，其實也是伴隨著電影及流行文化工業高強度的行銷活動策略，特別是好萊塢明星出席的首映會。正因如此，其認養的公有道路成為各式活動 (例如各種展示與銷售活動，或是歌友會等) 舉辦的熱門地點。從華納威秀和西門町的戶外活動分析比較上也已明顯地可以區隔出外國 (或國際) 與本土的差異。
26. 第二次通盤檢討中，有對企業提供公共活動空間 (包括展示場、會議廳、表演場等) 之容積獎勵。
27. 臺北國際金融大樓是由公部門主導並採取民間合作開發的方式來完成。在合作的形式上，採取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地上權的存續期間為 70 年)，由得標人以支付權利金與地租的方式提供基地予以得標人投資開發及營運 (蔡建國，1998)。
28. 參考本專輯金家禾教授一文。
29. Short et al. (1996) 建議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分析個別城市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的位階：(1) 金

融中心、(2) 企業總部、(3) 通訊／空運運輸節點通訊／空運運輸節點、(4) 全球觀瞻的地點 (sites of global spectacle)。就臺北來說，其在第 (1) 和 (4) 上略具顯著性，例如股市的成交總值 (1992 年排名世界第 13 位)，另其也成為全球流行文化在亞洲的重要市場。

30. Beaverstock, *et al.* (1999) 根據世界城市在高階生產者服務 (會計、廣告、銀行／金融、和法律) 的供應上所扮演的角色作為判準，將 112 個城市分級，其中歸納出 55 個世界城市，並分為三級 (首要、主要、和次要)，其中有 10 個 Alpha 級 (至少三類為首要或主要中心)、10 個 Beta 級 (至少三類，其中兩類至少要為首要或主要中心)、35 個 Gamma 級 (至少兩類，且其中一屬主要中心)，臺北除了在銀行服務屬主要中心外，餘皆屬次級中心。另外，Beaverstock 等人 (2000a) 也曾以世界城市體系的首要城市—倫敦來看其全球佈達 (global reach) 網絡，以臺北對倫敦連結來看，辦公室活動的連結 (office link)，只有在金融面排名在世界城市中的第十位；空運的連結，臺北則位於第三層。

引用文獻

- 金家禾 (2002) 臺北產業結構變遷與全球性功能發展之限制，全球化臺北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政府發展局。
- 林德福、劉昭吟 (2002) 生產者服務業—隨製造業外移而消失或轉型？全球化臺北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政府發展局。
- 林潤華 (2003) 象徵地景商品化過程中地方性之生產—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之豪宅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志龍 (2002) 後工業臺北多核心的空間結構化及其治理赤字，全球化臺北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政府發展局。
- 周素卿 (1997) 都市政治與都市發展政策：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和南港經貿園區的發展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 周素卿、陳東升 (2001) 後進者的全球化：東南亞臺灣企業地域生產網絡的建構與對外投資經驗，都市與計畫，28 (4): 421-459。
- 茂林國際開發顧問公司等 (1996) 臺北國際金融大樓規劃與開發技術顧問服務工作：市場與財務可行性分析與開發方案建議報告書。
- 陳水扁 (1996) 明日臺北—亞太金融中心下臺北新貌，臺北銀行月刊，26 (7/8): 2-9。
- 許雲凱 (2002) 華納威秀影城生產過程之政治經濟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清寰管理顧問公司 (1997) 信義計畫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規劃技術報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研究。
- 曾旭正 (1994) 戰後臺北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型態形構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景森 (1997) 序—改造臺北，1996 臺北市都市發展白皮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臺北市政府公告 (2000) 臺北市都市計畫書：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 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997) 1996 臺北市都市發展白皮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蔡建國 (1998) 都市發展過程中權力結構之研究：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家宜 (2001a) 臺灣百大豪宅住所大公開，商業時代，第 29 期。

- (http://magazines.sina.com.tw/businessstimes/contents/029/029-002_1.html)。
- 臧家宜 (2001b) 臺灣第三代豪宅大搜密, 商業時代, 第 33 期
- (http://magazines.sina.com.tw/businessstimes/contents/033/033-011_1.html)。
- 臧家宜 (2002) 想不想過癮當個豪宅主人, 商業時代, 第 65 期
- (http://magazines.sina.com.tw/businessstimes/contents/065/065-010_1.html)。
- Frieden, B. J and Sagalyn, L. B. (1989) 浴火重生：美國都市更新的奮鬥故事,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基金會譯 (1999), 臺北市：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 (1980) 市中心開發：都市發展與復甦, 劉麗卿譯, 臺北市：創興出版社。
- Beauregard, R.A. and Haila, A. (2000) The unavoidable continuities of city. In: Marcuse, P. and Kempen, R. (eds.) *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Oxford, UK: Blackwell, 22-36.
- Beaverstock, J.V., Taylor, P. J. and Smith, R.G. (1999) A roster of world cities, *Cities*, 16 (6): 445-458.
- Smith, R. G. and Taylor, P. J. (2000a) World-city network: a new meta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0 (1): 123-134.
- Smith, R.G. Taylor, P. J., Walker, D. R. F. and Lorimer, H. (2000b)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ome measurement and methodologies, *Applied geography*, 20: 43-63.
- Brenner, N. (1999) Beyond state-centrism? Space, territoriality, and geographical scale in globalization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 39-78.
- Davey, P. (2002) Eastern highrise, *Cranes Today*, July 2002: 16-18.
- Fainstein, S. (1994) *The City Builder: Poperty, Politics and Planning i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K: Blackwell.
- Ford, L. (1998) Midtown, megastructure, and world cities,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88 (4): 528-547.
-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es hypothes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1): 69-84.
- Friedmann, J. (1995)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In: Knox, P. L. and Taylor, P. J.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47.
- Friedmann, J. and Wolff, G.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 309-344.
- Hall, P. (1966)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Heinemann.
- Hannigan, J. (1998) *Fantasy City: Pleasure and Profit in the Postmodern Metropolis*, London: Routledge.
- Harvey, 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 (B): 3-17.
- Healey, P., Cameron S., Davoudi S., Graham S., and Madani-Pour A. (eds.) (1995) *Managing Cities: The New Urban Contex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Hill, R. C. and Kim, W. (2000)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37 (12): 2167-2195.
- Lauria, M. (ed.) (1997) *Reconstruction Urban Regime Theory: Regulating Urban Politics in a Global Econom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Leo, C. (1997) City politic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Lauria, M. (ed.) (1997) *Reconstruction Urban Regime Theory: Regulating Urban Politics in a Global Econom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77-98.
- Logan, J. and Swamstrom, T. (eds.) (1990) *Beyond the City Limi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D. and Salmon, S. (1995) World citie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the case of United States. In: Knox, P. L. and Taylor, P. J.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8-114.
- Marcuse, P. and Kempen, R. (2000) Introduction. In: Marcuse, P. and Kempen, R. (eds.) *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Oxford, UK: Blackwell, 1-21.
- Olds, K.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urban spaces: Pacific rim megaproject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7: 1713-1743.
- Olds, K. (1997) Globalizing Shanghai: the 'global intelligence corps' and the building of Pudong, *Cities*, 14 (2): 109-123.
- Olds, K. (2001)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Change: Capital, Culture and Pacific Rim Mega-Project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ncu, A. and Weyland, P. (eds.) (1997) *Space, Culture, and Power: New Identities in Globalizing Cities*,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 Zed Books.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 (1994)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Forge, CA: Pine Forge Press.
- Sassen, S. (1996) The global city. In: Fainstein, S. and Campbell, S. (eds.) *Readings in Urban The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61-71.
-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2n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vitch, H. V. (1988) *Post-Industrial Cities: Politics and Planning in New York, Paris and Lond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vitch, H. V. (1990) Postindustrialism with a difference: global capitalism in world-class city. In: Logan, J. R. and Swanstrom, T. (eds.) *Beyond The City Limits: Urban Policy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50-174.
- Shacker, A. (1999)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dynamics I. In: Moulaert, F. and Scott, A. (eds.) *Cities,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ety i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inter, 18-32.
- Short, J. R. (1996) *The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Cities, Cultures and Power*, Oxford, UK: Blackwell.
- Smith, C. S. (1999) Race for the sky, *World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Vol. 233 Issue 106, PB1, 0P, 2bw.
- Smith, D. A. and Timberlake, M. (1995) Cities in global markets: toward mapping the world-system's city system. In: Knox, P. L. and Taylor, P. J.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9-97.
- Smith, M.P. (1998) The global city - whose city is it anyway? *Urban Affairs Review*, 33: 482-488.
- Taylor, P. (1999) The so-called world cities: the evidential structure within a litera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1: 1901-1904.
- Wang, C. H. (2003) Taipei as a global cit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Urban Studies*, 40 (2): 309-334.
- White, J.W. (1998) Old wine, cracked bottle? Tokyo, Paris and the global city hypothe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33 (4): 451-477.
- Yeoh, B. S. A. (1999) Global/globalizing cit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3 (4): 607-616.

2003 年 7 月 15 日 收稿

2003 年 9 月 30 日 修正

2003 年 10 月 3 日 接受